

空间理论视阈下的《放生》及其隐喻

李慧娴

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, 浙江杭州, 311121;

摘要:《放生》以北京城区扩张为背景, 讲述了北京居民区内, 一对以经营菜店为生的外来夫妻面临菜店拆除危机。夫妻二人在北京人黄主任与罗阿姨的指导下, 通过放生鲫鱼来“转运”, 但最终未能改变菜店被拆除的结局。在故事结尾, 北京牌照的面包车又成为了夫妻二人的“新菜店”。在小说中, 黄家庄、小区、夫妻菜店、公园、面包车等都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, 而是承担着历史、文化、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富有意味的场域。本文试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出发, 解码《放生》中的空间隐喻, 从而探究小说意旨。

关键词: 空间理论; 《放生》; 城乡叙事

DOI: 10. 64216/3080-1516. 25. 10. 048

1 空间实践: 实体空间

谢尔兹将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概念与常识意义上的感知空间相对应。另一位列斐伏尔研究者埃尔登认为感知的空间是一种物理的空间。^[1]《放生》中, 作家设立了多个富有隐喻内涵的空间实践, 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范畴, 而是如同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认为的那样, “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”^[2], 隐喻着作家对城乡关系的思考。

1.1 居民区——城里人与乡下人

在《放生》所构建的居民区中, 居民楼与地下室、公共厕所几个不同的空间构成了城乡分野, 分别隐喻着北京人与外来客两个群体, 承载了作家对两个群体间社会关系的思考。

在作品里, 原先的村庄黄家庄在北京的发展扩大中被“摊进煎饼里”, 原先的平房变成了楼房, 住进了五行六业的干部。小区设施完备, 拥有停车场、健身房与花园。小说中的居民楼“一共是九栋, 最高的有二十六层, 最低的也有五层”, 而住户则“一个两个、十个八个, 都是来历不凡的样子”。甚至连原来黄家庄的村民, 也不再是农民, 而是市民, “他们有的分到了三套住房, 有的分到了两套, 最少的也分到了一套, 做到了真正的居者有其屋”。居民楼和小区等空间, 整齐、整洁, 彰显着干部、市民的城市身份。

小说中的外来客, 牛国亮与马长平夫妇, 同样也居住在居民楼中。即使与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在小区空间中, 外来客却并不能共享象征着城里人身份的居民楼。相反, 他们的生活环境是逼仄、局促、邋遢的, 居住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。地下室“没窗户、不透气”“有挥之不去的潮霉味”。蜗居在此处的牛国亮、马长平这一对外地

夫妻在楼房之间立足, 以经营菜店为生, 试图在居民楼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同为外来客, 老乡老杨则生活在男女厕所外的值班室中, “两口子吃饭、睡觉都是在值班室里进行, 等于也是在厕所里进行”。

居民楼、地下室与公共厕所高度的差异、空间位置的不同, 喻示着城乡地位天然的不平等, 外地人屈居人下, 而城里人高高在上。基于此种不对等的空间关系, 刘庆邦的《放生》聚焦外来客在北京底层生活, 关注外来客的生存境遇。

1.2 菜店、公园——乡下人在城里的生活

在《“乡下人进城”叙事与“城乡意识形态”》中, 徐德明指出, 城乡空间行动的上下之分, 上城与下乡, 已经被凝定为意识形态。当代的城乡意识形态并不因为社会的物质进步得到改观, 相反被强化了。同时, 正是城乡意识形态成为乡下人进城的文化障碍。《放生》中被叙述的牛、马二人生活在城/乡的文化框架中, 同时也因固有的城乡意识形态始终游离在真正城市之外, 面临着“存而不在”的生存境况。

菜店被城管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, 牛、马等外地人试图融入城市的途径落空。孟繁华认为: “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……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”。菜店的拆除正暗喻着城市对乡村的拒绝, 即将被拆除的菜店与即将失去谋生之路的牛、马二人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, 折射着乡下人在城市中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。

面对城管部门的判决, 牛、马夫妇没有钱、没有人脉, 除了等待二人无计可施。正如祥林嫂求助于神明, 牛、马二人无处可依, 因此将放生鲫鱼视为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, 将希望寄托在“放生”上, 盼望着能够转运。

居民楼边上的柳荫公园就成为牛、马夫妇放生、转运的空间。在小说中,马长平带着三条活生生的鲫鱼,避开戴红袖章的公园巡查员,找到公园深处一处背人的地方,心惊胆战地将野生鱼放到湖里去。公园、公园中的湖两个空间也成为了牛、马夫妻的精神寄托,同时也无情地彰显了二者作为外来客,在北京孤立无援的生存状况。

2 空间的表象

列斐伏尔指出,空间表象“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‘秩序’捆绑在一起,从而也与知识、与符号、代码以及种种‘前台的’的关系”。施米德在《城市、空间与社会: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论》中,将空间表象解读为“逻辑的与形式化的抽象精神领域,以一种实践与感觉的方式描绘出来”。因此,空间表象所指的是一个与现行社会秩序相关的抽象概念。在小说《放生》中,空间表象则是隐形的、由权利关系决定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俯视姿态。

2.1 城乡之间

在刘庆邦的笔下,城乡的对立并非赤裸的、极致紧张的,而是在表面和谐的底下潜藏对抗、紧张、排拒的真相。北京人与外来客的交集,就在牛、马二人的菜店中产生。北京人中不乏和善之人。前来买菜的顾客总是亲切地以“平”称呼马长平,曾在某个报社编辑部当过主任的黄主任,几乎每天都来菜店报到,给小马出了放生鲫鱼转运的主意。罗阿姨是黄家庄的原住民,常替马长平在菜店值班,甚至替她买东西、收菜钱。

但这一派祥和的表象之下,却暗藏乡下人寄居城市的尴尬处境。经营着菜店的马长平面容姣好,不少顾客以动作或言语轻薄她,但碍于外来者的身份,碍于“人在屋檐下”,小马总是忍了又忍。甚至菜车被路过的金毛犬滋了一泡水,夫妻二人也只能“低下眉”。

甚至,与小马相熟的黄主任、罗阿姨都没忘记小马“农村女人”与“外地人”的身份,在潜意识中透露了不屑。黄主任以观察小马为乐,在他中,小马是比花儿、西红柿更加好看、出色的女人,“他一不卖菜,二不买菜,就是愿意去菜店里看小马”。黄主任不厌其烦地观察小马红色的面庞、白色的牙齿、匀称的身材、带着罩袖的红石榴籽围裙。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黄主任的对小马不怀好意。甚至罗阿姨也提醒小马小心这个“老色鬼”。当然黄主任并没忘记小马“农村女人”的身份:“黄主任……甚至想,作为一位农村的女人,长得差不多就行了,长这么好看干什么!”。黄主任对待小马并非欣赏,其大胆的目光带着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凝视和审

查。同样,罗阿姨虽然对小马亲切,却在无意识中透露了对外来客的鄙夷。在罗阿姨口中,“那帮管公园的”外地人是“孙子”,“狠着呢”。

在另一空间,公园水池中,刘庆邦将观赏鱼与野生鱼设定为一对二元关系,这对关系正隐喻了北京人与外来客之间不平等的关系。“观赏鱼大概知道它们在公园里的优势地位……显得很强势。而那些野生鱼大概也意识到它们是卑微的弱势群体……”出于同情,马长平在放生时,为避免野生鱼受到观赏鱼的排挤和欺负,特意将野生鱼放在公园深处。然而,此类野生鱼最终也没有摆脱惨死的命运,最终死于“水土不服”。野生鱼、外来客,尽管努力在公园的水池中生活,但依然无法找到生存之法。它们始终有着人在屋檐下的自觉与自卑,始终在自己的“弱势”地位上“水土不服”。它们所面临的,正是“城市是城里人的,城市不承认你、不接纳你”(《到城里去》)的无力状况。

菜店这一空间最终还是被拆除了。在居民的喝彩声中,菜店沦为废墟。牛国亮只能以摔碎西瓜来作为反抗,但这反抗显然于事无补。北京人与外来客、观赏鱼与野生鱼两对关系互为对应,揭示了作为北京人与观赏鱼自觉的高位姿态,及这种姿态对外来客、野生鱼的隐形倾轧。在和谐相处的面纱之下,作为北京边缘的小人物,小牛、小马、老杨、野生鱼只能承受来自黄主任的凝视,来自罗阿姨无意识的鄙夷。

2.2 同为外来客

但刘庆邦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城乡冲突对峙的层面上,在《放生》的俯视链中,不仅有北京人对外来客的俯视,外来客与外来客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权利的高下之分,作为弱者的外来客只能够挥刀向更弱者。同样,同为北京人的黄主任和罗阿姨之间也并不平等。因罗阿姨是“回迁的坐地户、也是地头蛇”,所以黄主任不敢对罗阿姨有半分得罪。因此,从这一层面上来说,小说摆脱了单纯的城乡二元叙事结构,而是揭示了城与乡冲突的本质,即权利地位决定的俯视与被俯视、侵占与被侵占的权利关系,这样的权利关系在同为外地人的人群中依旧发挥着有效性。

同在异乡,同为弱者的外来客之间并没有其他情感连结,只是老乡——一个由悬置的故乡而产生的称呼。这个故乡存在于观念中,与现实的生存境况隔了万里千里。因此,异乡人之间少有真正的情谊,也没有互帮互助的自觉,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用敌对、淡漠形容。在小说中,牛国亮看不起看守厕所的老乡老杨,“平日里,牛国亮对老杨的营生有些看不起,不愿意让他到菜

店里来,更不要说请他喝酒”。在牛国亮看来,与经营菜店相比,经营公共厕所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。与此同时,老杨也对牛国亮没什么好脸色,对即将被拆除的菜店冷嘲热讽,恶语相向。牛国亮没有对老杨说难听话,只是因为“菜店暂时还没有开张”,用水要“到厕所的水龙头那儿去接”。前两年,老乡们因为城市治理飞掉了饭碗,但牛国亮夫妇也仅仅是“深感庆幸”,而非产生同情。

在公园这一空间中,刘庆邦不仅借观赏鱼与野生鱼,揭示了外地人在北京尴尬、无助的生存境遇,更道出了外地人群体中的地位差异。北京人雇佣带红袖章的外地人管理公园,外来的“巡查员”的工作之一,就是在公园水池中打捞起因水土不服死去的野生鱼。巡查员与野生鱼也同样是外来者,然而外来者之间也有级别之差,一个有着打捞的权利,另一个只能无奈死去。在异乡死去的野生鱼,最后由同在异乡的外来客助它脱离致死的环境,即使刘庆邦在《放生》中描绘了外乡人之间的俯视关系,但依旧在盼望着一个温情的情感连结。

3 表征性空间

施米德认为,表征空间是“一个规划设计与展望的领域,一个象征的与乌托邦的领域,一个想象和欲望的领域”。在小说《放生》中,被拆除菜店的牛、马夫妻坐在面包车上望着雨出神,此时黄主任路过,提醒二人可以利用面包车卖菜。面包车逼仄,狭小,但与菜店这一违章建筑不同,牛国亮与马长平两口子的北京牌照汽车已获得了合法性。在小说的尾声中,面包成为了夫妻二人的新菜店:“第二天雨过天晴,牛国亮果然又拉回了一车新鲜蔬菜。”此时,面包车成为一个富有意味的空间——面包车再次成为二人生存的依靠,一个在异乡生存的乌托邦。

峰回路转,夫妻二人又重新找到了谋生之法,作家似乎给作品留下了一个带有光亮和希望的结尾。然而,探究面包车这一空间背后潜藏的隐喻意,则能品味出这结尾背后潜藏的悲剧含义:与房屋相比,面包车是无根的,流动的,恰如异乡人在城市中漂泊无依的生存境遇。这对不被城市认同的夫妻二人将希望寄托在一个飘摇的汽车上,其结果不言而喻。

有研究者指出,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叙事,“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,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,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,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‘在路上’

的迷惘和期待”^[3]。通过面包车这一空间,这一个被主人公视为寄托与依靠的空间,作家揭示了异乡人看似可以通过努力打破城乡意识形态、融入城市,实则带有悲剧底色的生存境况。

《放生》中的牛、马夫妇二人幻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,达成阶层上的跃升。小马“不收费的时候……一刻也不闲着,动手整理那些菜”,她根据卖相给蔬菜分类,捋顺韭菜,用竹片清理鸡蛋。小牛则是早起买菜,日夜颠倒,“每天凌晨三点,牛国亮驾车去郊区的蔬菜批发地拉菜,路上来回跑三个多钟头”。他们也试图通过学习城市人的生活方式,来习得城市人的身份。牛国亮与马长平学习着城里人的消费方式,以饰品装点自己,“牛国亮脖子上挂上了金链子,马长平的手指上套上了金戒指……这都表明他们菜店的生意不错,夫妻俩已过上了闪闪发光的金质生活”。他们被顾客喊做老板、老板娘,但也被黄主任喊做小牛、小马。在城市中,乡下人是这样努力地融入城市之中,勉强地证明自己在城的合法身份。

因此,牛、马夫妻心中的乌托邦面包车,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外乡人漂泊的宿命,隐喻他们在城市中真实的生命图景。

4 结语

《放生》以居民楼、菜店、公园等空间揭示了城市对外来客的排拒姿态,与外乡人尴尬的生存境地。然而,作家并未局限于城乡二元的叙事方式,而是指出,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由权利关系决定的,权利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俯视姿态,而这种姿态在北京人之间、外地人之间也同样存在。在揭示权利关系的过程中,作者对城乡融合的未来表露出悲观的态度,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故事结局。

参考文献

- [1]亨利·列斐伏尔:《空间的生产》,商务印书馆,2021年,第9页。
- [2]莱考夫,约翰逊: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5年,第3页。
- [3]雷达:《打工文学不应该做白日梦》,《北京晨报》,2011年5月20日。

作者简介:李慧娴,女,汉族,浙江温州人,研究生,中国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方向。